

书评

《马来西亚史》

廖文辉*

(LEW Bon Hoi)

陈鸿瑜, 《马来西亚史》, 台北: 兰台出版社, 2012. ISBN: 978-986-6231-34-6

虽然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已逾半世纪, 但马来西亚历史的研究仍然以英文学界为主导, 马来学界可谓乏善可陈, 既便是由马来学者撰述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 也是以英文发表。华文源流方面, 除了二战前后的南洋研究学人有所涉及, 1980年代以后马新华文学界的马来西亚史的研究无疑不足为道。反而在海峡两岸仍然有学人持续不断进行相关的研究, 并有不错的成果涌现。

以中文著述的马来西亚通史, 一直是马新华文学界的罩门。许云樵的《马来亚史》(1961) 只论及马六甲王朝以前的历史, 只能说完成了前半段, 后半段虽有《马来亚近代史》(1962) 上下两册弥补空白, 但却是以教科书的形式书写, 并非严谨的学术著述。在许著《马来亚史》之前, 钟敏璋虽有《马来亚历史》(1959), 完整论述石器时代以来至马来亚独立的历史, 其论述也不断为后来者引用, 可惜的是这也是一本教科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我们仍然无法盼到以中文书写, 并具有学术价值的马来西亚通史的出版, 近来台湾学界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缺憾。

台湾的陈鸿瑜教授, 从2008年开始, 陆续出版了印度尼西亚(2008)、越南(2009)、新加坡(2011)和菲律宾(2011)等东南亚国家通史性质的专书。2012年再接再厉, 出版《马来西亚史》, 全书657页, 102幅插图, 35个表, 可谓宏篇巨构。陈教授现为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 长期关注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历史, 相关著述极为丰富。

本书共14章, 另有三篇附录, 从史前到当代政经发展, 上下纵横数万年, 除了图表, 另附有各州王朝的世系表, 内容鸿丰。本书论述采编年方式, 以政治史为主轴, 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叙述能详其始末原委, 巨细靡遗。这种细致详尽的风格也反映在原始文献的征引方面, 书中附上不少各类条约、内容、备忘录和法令等重要

* 廖文辉博士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电邮地址: bonhoi.lew@newera.edu.my

条文。加上作者东西交通研究的专业背景，因此在古代史的部份大段征引中国载籍中相关的文献以为论述说明。同时，作者为政治学专业出身，故此对战后部份的铺陈，几占全书之半，尤详于战后马来西亚的政经发展和外交国际关系，可谓详今略古。本书第13章〈马来西亚文化〉，主要介绍马来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字文学、表演艺术和宗教，可谓神来之笔，恰好可调和政治史意味过浓的问题，这也是中英文马来西亚通史著述中几乎略过不提的部份，这是本书最为独到之处。此外，从书后参考文献可知，作者是在广泛阅览多种中英文马来西亚通史性质的著述，再辅以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博采众家，融会贯通。

惟其如此，本书在某些内容仍可加强和补充。书中除了介绍几个印度化国家，却没有论述印度文化的作用和影响，马来半岛受印度文化影响千余年，其痕迹至今仍在，略而不论，难免有所不足。百年战争是马来亚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对马来亚历史影响深远，但作者仅论述战争经过，却没有针对其原因和影响加以探讨，甚至也没有指出这场延续百年的战争名为“三角战争”，仅在“荷兰入据马六甲”一节内叙述，无法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为一多元民族国家，但原住民和印度人的论述着墨极少，有关领域的成果目前不在少数，应当加以整理论述。马来西亚文化一章，应该是最值得期待的部分，因为不论中英的相关论著，几乎都没有设置这一章节。不无可惜的是，通观全章，论述不是流于表面，就是过于简略，这或许是论述资料以网页和报章为主，极少参考相关学术成果所致。宗教信仰的部分，似乎过于侧重马来西亚当代政治中的伊斯兰教课题的争论，与其他族群宗教信仰的行文不成比例。在马来西亚史研究上，米尔斯（L. A. Mills）的《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 1824-67*）和张礼千的《马六甲史》皆是重要的文献，尤其是前者，已经是公认的经典著述，却没有出现在参考书目内，文中的脚注似乎也不曾见及。

再者，某些地名和人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作者往往依据己意加以音译，而没有采用当地规范或约定俗成的译名。如地名Sungai Siput，应译为“和丰”，书中音译为“山盖西蒲”；Tanjung Rambutan，应译为“红毛丹”，书中音译为“丹绒南布坦”；Kampung Baru，应译为“甘榜峇汝”，书中音译为“巴陆”。人名Megat Junik，应译为“梅格朱尼”，书中音译为“朱尼德”；Barnes，应译为“巴恩”，书中音译为“彭纳斯”。报纸*Utusan Melayu*，应译为“马来前锋报”，书中意译为“马来由信使报”等等皆是。

作者在最后一章结论中某些议题的观点，不少存有极大争议，大有商榷余地。在族群关系方面，作者认为：“三大族群各安其位，各有其专长的工作……并非英国或荷兰的刻意‘分而治之’政策之安排。”并进一步申述英国答应马来人限制华人取得平等的公民权以及保障马来人的特权，“反而激起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抗，终于爆发武装革命运动”（页570-571），因此“马来亚共产党的叛乱活动，基本上是个种族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页573）。在人权方面：“马哈迪在1999年开始重视人权问题，在外交部底下设立人权委员会，纳吉政府也在考虑修改

一些限制人权的措施，假以时日，马国改善人权的前景，应可预期。”（页578）

本书对史实的整理和论述详尽，虽然某些论述对通史而言无疑过以厚重和琐碎，然瑕不掩瑜，除了学术性强、可读性高，对中文著述的马来西亚史缺席半个世纪的马新学界而言，不仅意义深长，同时也警惕马来西亚本土研究人员必需急起直追。